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

孙江 主编

*

LES LIEUX DE MÉMOIRE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法] 皮埃尔·诺拉 主编

黄艳红 等 译

PIERRE NORA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

孙江 主编

LES LIEUX DE
MÉMOIRE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

黄艳红 等 译

PIERRE NOR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法)诺

拉主编;黄艳红等译.一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8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孙江主编)

ISBN 978-7-305-15681-6

I. ①记… II. ①诺…②黄… III. ①社会史—研究
—法国 IV. ①K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2184 号

Les lieux de mémoire

© Gallimard(Paris), 1984, 1986, 199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2-01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孙江主编

书 名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主 编 [法]皮埃尔·诺拉

译 者 黄艳红 等

责任编辑 陈蕴敏

责任校对 张倩倩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34.75 字数 516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681-6

定 价 8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本书系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批准号: 13&ZD191)

*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编委会

*

主 编 孙 江

副主编 陈蕴茜

编 委 王晓葵 李里峰 李恭忠

范 可 周海燕 黄东兰

黄兴涛 麻国庆 [德] Mac Matten (王马克)

[日] 南 诚

助 理 王 楠 闵心蕙

中文版序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

孙 江

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 (历史在加速)。^①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在其主编的《记忆之场》导言中劈头如是说。基于这种当下的紧张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开始，诺拉动员 120 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 135 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超过 5600 页的皇皇巨著。与以往强调对过去发生之事进行考索的历史研究不同，与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心性史”研究亦径庭有别，这部巨著乃是要在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

1931 年 11 月 17 日，诺拉出生于巴黎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下，作为犹太裔法国人，诺拉家族经历了抵抗运动的惊

①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I,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p. XIX, 1997, p. 25.

险。战后，诺拉进入路易勒格朗中学 (Lycée Louis-le-Grand) 读书，最后在索邦大学 (Sorbonne) 取得大学学位。1958 年，诺拉赴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所高中 Lycée Lamoricière 任教，1960 年返回法国，翌年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书，批判作为“殖民者”的法国人与作为“内地人” (Métropole) 的法国人之不同，^①该书经常被作为学术著作来引用，其实它只是诺拉个人的观察记录，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②

1965—1977 年，诺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学院 (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谋得教职。这期间的诺拉，与其说是教授，不如说是编辑，与其说是学者，毋宁说是记者。1964 年，他在 Julliard 出版社创办“档案丛书”。1965 年成为伽利玛 (Gallimard) 出版社编辑，先后创办“人文科学丛书”“证言丛书”“历史学丛书”等。1980 年，又与哲学家戈谢 (Marcel Gauchet) 创办《辩论》 (Le Débat) 杂志，引领法国知识界的前沿话题。在诺拉主编的丛书中，收录了“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拉迪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等人的著作。1974 年，热衷于讨论历史研究方法的诺拉与勒高夫合作主编三卷本《创作历史》 (Faire de l'histoire)。^③上述学术组织活动为其日后延揽 120 名作者进行“记忆之场”研究构筑了必不可少的人脉关系。

转机来临。1978 年诺拉在堪称“年鉴学派”大本营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讨论课。其时，法国历史学界正经历回归政治史研究、重新评价叙事史的新趋势。2002 年，诺拉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其主编的《重新思考法国》第一卷导言中，直言 20 世纪 60—70 年代“年鉴学派”布罗代

① Pierre Nora, *Les Français d'Algérie*, Paris: Julliard, 1961.

② Todd Shepard, *The Invention of Decolonization: The Algerian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Fra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96.

③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Fai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4.

尔 (Fernand Braudel) 史学是对“事件史的十字军”，^①而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心性史”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不过是那种“科学的”数量统计方法的延伸，量的统计未必反映质的变化。诺拉呼吁关注被历史学者忘却的当下的“历史”——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是诺拉生造的术语，由场所 (lieu) 和记忆 (mémoire) 两个词构成。叶兹 (F. Yates) 在《记忆术》一书中曾谈及拉丁语中的“loci memoriae”。^②“loci”是“locus”的复数，有场所、位置及身份等意思。显然，诺拉的“记忆之场”要比该词的原始意义宽泛得多。1984 年《记忆之场》第一部《共和国》(La République) 一卷出版，该卷从第三共和国开始，分象征、纪念性建筑物、教育、纪念活动和反记忆等五个主题，选择的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场所和事例。1986 年第二部《民族》(La Nation)^③三卷出版。第一卷“遗产、史学编纂、风景” (héritage, historiographie, paysages) 偏重于“非物质性”内容；第二卷着力于物质层面——“领土、国家、遗产” (le territoire, l'état, le patrimoine)，既有国境、六边形象征，也有凡尔赛宫等记忆装置，还有历史遗产及其保护运动等；第三卷“荣耀、词语” (la gloire, les mots) 与理念有关，分别考察了军事上的荣耀与市民荣誉、言语与文学以及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事物。1992 年第三部《复数的法兰西》(Les France) 三卷出版。在第三部中，“记忆之场”的概念有所扩大。第一卷“冲突与分割” (conflits et partages)，围绕政治区隔、宗教少数派、时空分割 (海岸线、巴黎与地方、中央与周边等) 而展开；第二卷“传统” (traditions) 包括反映“法国传统”的钟楼、宫廷、官僚、职业和《法语史》等，还有地方性文化、法兰西个性等；第三卷“从档案到标志” (de l'archive à l'emblème)，涉及记录、名胜和认同等。

① Pierre Nora,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1,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② Frances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p.2.

③ “Nation”一般被译作“民族”，其实还有另一层涵义：“国民”。

《记忆之场》是关于记忆叙事的百货店，既有旁征博引的长篇论文，也有寥寥数页的随笔；既有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勒高夫、拉迪里、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名家，更多的是不知名的作者。1996—1998年，在诺拉本人的参与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从原著中精选44篇，编为3大册，以英译名 *Realms of Memory* 出版。^①2002年，日本岩波书店选取其中31篇，编译为三册出版。^②其间，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也先后出版了不同节译本，而仿照《记忆之场》的各种研究更是不断出现。

在历史学发达、名家林立的法国，尚未出版过一本专著的诺拉一跃而为众目所瞩。^③1993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同年《罗贝尔法语大词典》（*Grand dictionnaire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收入“*Lieux de mémoire*”。2001年6月7日，诺拉被选为仅有40名定员的法国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列第27位）。《记忆之场》一书成为诺拉本人的“记忆之场”。

2009年，我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持跨学科研究计划“南京：现代中国记忆之场”时，即已着手《记忆之场》的翻译。一如美国和日本的译本各取所需，我们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选取了其中29篇论文和版权方伽利玛出版社交涉，很快得到善意的回复。诺拉本人也很高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记忆之场》引起了关注。翻译是件苦差事，“所有的翻译，在与原作的意义层面的关系都是片段”^④。我们决定一边交涉版权，一边分头翻

① Pierre Nora,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Realms of Memo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ピエール・ノラ编《記憶の場：フランス国民意識の文化＝社会史》，谷川稔监译，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

③ 近年诺拉相继出版了若干本著作。分别是自传体《公共历史学家》（*Historien Public*, Paris: Gallimard, 2011），讨论历史认识论的《现在、国民、记忆》（*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2011），研究1789年以来法国的记忆和认同问题——“国民”“共和国”“革命”——的《法国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 Paris: Gallimard, 2013）等。

④ 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译。半年后，伽利玛出版社突然来函，先是质疑译者水平，继而又质疑我们计划的可行性，结果我们只得到 11 篇论文的授权，其间的故事和曲折，业已成为我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之场”。不谈。

我们将本书收录的 11 篇论文分为三组：“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和“记忆与叙事”。如此划分完全出于阅读之便。“记忆与象征”收录《七月十四日》《〈马赛曲〉》《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行车赛》。“记忆与叙事”收录《贞德》《自由·平等·博爱》《拉维斯的〈法国史〉》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录》。“记忆与历史”收录主编诺拉所写的导言或结语，《记忆与历史之间》（1984）系第一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1992）为第三部第一卷导言，《纪念的时代》（1992）附于第三部第三卷末，相当于全书的结语。鉴于在第二部三卷中，诺拉只留下一篇简短的《民族与记忆》的结语性文字^①，这三篇文章应该是理解编者意图的最重要的文字。

二

今日无事。

1789 年 7 月 14 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这天夜里巴士底狱发生的暴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将其送上了断头台。“伟大的日子唤起伟大的记忆。对某些时刻而言，光辉的记忆理所当然”（维克多·雨果）。1880 年，7 月 14 日被确立为法国国庆日。吊诡的是，巴士底狱并非被攻陷，狱中关押的仅七名犯人亦未受到一般意义上的虐待。在《七月十四日》一文中，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Christian Amalvi）爬梳了 7 月 14 日如何从右翼眼中的“狂暴之日”变成全法国人的“庆典之日”的过程，恰如作者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已不再被视为决定性、关键性的记忆，我们今天经历

^① Pierre Nora, La nation-mémoire,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II, *La Nation*, Paris: Gallimard, 1986, pp.647 - 658.

的国庆节已经没有了历史和政治内涵”。

1792年4月20日，革命的法国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宣战，4月25日到26日之间，工兵上尉约瑟夫·鲁热·德利尔（Rouget de Lisle）在斯特拉斯堡谱写了一曲激励战士的《莱茵军团战歌》，这就是1879年2月14日被定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和7月14日一样，关于《马赛曲》的争议亦从未停止，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马赛曲》考察了围绕《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史，最后他发问道：“今天谁还记得，谁还能唱起过去在学校里学会的那三段歌词中的第一段——且不要说全部三段了”。

围绕7月14日和《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和政治和解似乎应验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纪念历史”的断语：“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将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其目的就是不讲原因，只讲结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纪念的历史’尽量远离原因。”^①相比之下，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行车赛就没有那么多的历史纠结。1889年，正当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巴黎竖起了为迎接博览会而建的高达300米的埃菲尔铁塔。这座让附近的巴黎圣母院钟楼黯然失色的铁塔，在虔敬的教权主义者眼中是“渎神”的象征，而共和主义者则赋予铁塔复仇的意蕴，念念不忘“普法战争”败北屈辱的德莱扬（A. Delaunay）有诗道：“屈服吧，德国佬/看看这举世无双的奇迹。”铁塔建成20年后，承包人埃菲尔收回经济效益，将铁塔所有权交付给巴黎市政府，但他的名字和铁塔一起成为巴黎的标志。亨利·卢瓦雷特（Henri Loyrette）的《埃菲尔铁塔》让读者认识了埃菲尔铁塔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角色。

1903年7月的一个晚上，《汽车报》（L'Auto）主编德格朗热（Desgrange）为了与其他体育报一争高下，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想出了举办环法自行车赛——“一个完全裹着法国的环”。这项普通的体育运动

①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后来演变为法国人生活中的重要节日，成为“国家的财产”和“民族遗产”。乔治·维伽雷罗 (Georges Vigarello) 的《环法自行车赛》以百年为经，探讨了环法记忆是如何变成一种国家制度，并最终成为每个时代法国人的记忆之场的。了解法国史的读者知道，宣称“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很少居住在巴黎，而是经年累月地巡行于各地，宣示统治的有效性。让路易十四黯然的是，德格朗热创意之下的环法自行车赛仅用“游戏”即整合了国家，把国土空间 (espace-nation) 搬上舞台，把领土当作布景，展示了从一个乡土的法兰西到旅游胜地的法兰西，从意志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教育的转化。

上述记忆之场均源于一个偶发事件，事后被分别赋予了社会政治意义。对历史客观性持怀疑态度的保罗·德曼 (Paul de Man) 在《康德与席勒》(Kant and Schiller) 一文中写道，历史没有所谓进步与倒退之分，应该将历史视为一个事件 (event)、一次出现 (occurrence)，“只有当权力 (power) 和战斗 (battle) 等词语出现时才会有历史。在那个瞬间，因为发生 (happen) 各种事情，于是有了出现，有了事件。因此，历史不是时间的概念，与时间毫无关系，仅仅是从认识言语中突然出现的权力语言”^①。如果把这里的认识语言置换为米歇尔·德塞托 (Michel de Certeau) 所说的社会政治事件的“痕迹”的话，似乎可以有保留地加以接受。不是吗？虽然事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所知晓的东西，从事件的因果链中无法说明事件的本质，但通过对事件留下的“痕迹”的爬梳依然可以辨析其语义学 (sémantique) 价值。^②拉维斯的《法国史》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分别搜集事件“痕迹”，建构起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心目中的法兰西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催生了欧洲大陆近代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的

① Paul de Man, *Aesthetic Ideology*,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33.

② Michel de Certeau,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5.

形成，而民族-国家的诞生又催生了以“民族史学”为旨归的近代历史学的诞生。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史学”为民族史学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工具。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既互相敌视，又相互学习的邻邦。19世纪60年代，后来成为法国史学泰斗的拉维斯（Ernest Lavisse）和莫诺（Gabriel Monod）都曾留学德国。可以说，如果没有兰克史学，很难想象会有拉维斯的《法国史》。《记忆之场》主编诺拉亲自执笔写作《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表面上似乎要解构拉维斯所建构的法国民族史，而从其将米什莱（Jules Michelet）、拉维斯和布罗代尔法国史学三巨匠置于史学史谱系上加以比较可知，他意欲以“记忆之场”建构一个新法国史。因此，诺拉关心的不是拉维斯写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写。拉维斯与其前辈米什莱关注民族国家的时间等级——法兰西起源不同，关心的是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空间等级——路易十四以来的法兰西轮廓，诺拉认为在卷帙浩繁的27卷《法国史》中只有《法兰西地理图景》和拉维斯执笔的两卷《路易十四》“代表了民族认同最强烈的时刻”。“拉维斯的二十七卷《法国史》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源源不断出现的法国史书，并成为记忆之场，是因为其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结合在了一起。这二十七卷《法国史》就像一个大熔炉，两个真理在其中短暂地交融在了一起。这两个真理在今天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然而在当时却是互相补充、不可分割的，那便是档案的普遍真理性以及民族的特殊真理性”。拉维斯“确立了法兰西鲜明的形象，并最终悬起一面明镜，在这面镜子中，法国不断地重新认识着自己”。

如果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和拉维斯的《法国史》做比较，看似唐突，但并非没有道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

个别的事”。^①应予以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谓“历史”（ιστορία）与今日用法不同，是调查研究及其结果之意。确实，拉维斯以严谨的科学方法撰述法兰西民族历史，普鲁斯特以冷静的笔触刻画一个个法兰西人——上流休闲社会的历史，拉维斯的《法国史》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记业已定格在过去的时空中，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仍然活在当代法国人乃至其他国家读者的心中。在法国，上至共和国总统，下到一般国民，“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人人读到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只要有人想要写作，小说就有幸成为指引我们的北极星，或是使我们迷失的捕鸟镜”。现在，关于普鲁斯特的书籍已超过了两千本，普鲁斯特是如此有名，书可以不通读——很少有人通读！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所写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不妨一读，跟着作者优美的笔触，读者可以追寻法国历史上的似水年华。

过去不在，过去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自由·平等·博爱”箴言作为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名词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然而，正如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在《自由·平等·博爱》一文所指出的，“我们更注重其象征意义而非其内涵的价值”，在法国大革命的一百多年后，“只有通过这三个疲乏术语的单调诵唱，这句箴言才有机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生存下来”。在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是依次出现的，其中“博爱”出现最晚，1789年《人权宣言》没有，1791年宪法只隐晦提及。“自由”关乎人的价值，“平等”涉及社会规则，那么，“博爱”是什么呢？网球场宣誓和爱国教会所宣称的“博爱”不是一回事，前者源于共济会的兄弟之爱，后者强调来自上帝的馈赠。细究起来，在中文约定俗成的翻译里，“博爱”是个大误译。与汉语“博爱”相对应的英文“philanthropy”、法语“philanthropie”源于希腊语“φιλανθρωπος”，这个词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φίλος”——“爱”，另一个是“ἄνθρωπος”——“人类”，合起来即“人类爱”，而被翻译为汉语“博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8—29页。

爱”的法文原文是“fraternité”，即英语“fraternity”，意为“友爱”“兄弟爱”，其词根即拉丁文“frater”——“兄弟”。

博爱难，友爱也不易。在鲁昂遭受火刑的巫女（sorcière）——贞德折射了法国内部的分裂与和解。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女儿在完成从奥尔良的城墙下到兰斯大教堂的旅程后，成为“祖国的圣女”——天主教法国与共和主义法国的和解。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的《贞德》剖析了时空上的漫长和解旅程。贞德曾是时代的象征，在经历了被遗忘或被忽视的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后，有关她的记忆在19—20世纪重新活跃起来。贞德曾是地域差异化的象征，15世纪有关她的记忆仅止于地域、家族，虽然1429年法国国王加封贞德家族为贵族，赐姓迪利斯（du Lys）——象征法国王室的百合花。贞德曾是党派博弈的符号，在整个19世纪，有三种贞德记忆：天主教圣徒、爱国者和排他民族主义者。20世纪的政治家和各党派出于法国人的团结以及作为团结之对立面的党派主张之目的利用贞德。

三

上述论文是《记忆之场》135篇论文中的9个片段，要了解主编诺拉是如何统摄这些片段的，读读他写的长篇导言和结语无疑是有益的。

导言《记忆与历史之间》不好读，诺拉使用了很多带有感情色彩的修辞，将其关于记忆之场的思考包藏其中。如在第一段末尾，“正因为没有记忆，记忆才被谈起”（On ne parle tant de mémoire que parce qu'il n'y en a plus）^①，诺拉到底要表达什么呢？通读整篇文章可知，诺拉如是说乃是与其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看法有关的。诺拉强调，在历史加速度消失的当下，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拉大，二者浑然一体的时代业已终结。对于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诺拉有多种表述：“这里所说的记忆，是所谓原始而古旧的社会记

^①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I, p. XIX, 1997, p.25.

忆，它表现为一种模式并带有秘密性质，历史则是我们这类社会从过去之中创造出来的，而我们的社会注定要走向遗忘，因为它们处于变迁之中”。“histoire”在法语中意为经验过的历史和让这种历史变得可以理解的思想活动，诺拉用一组排比区分记忆和历史的关系。(1) 记忆是鲜活的，由现实的群体承载；历史是对过去事物不完整的、成问题的重构。(2) 记忆是当下的现象，是经验到的与现在的联系；历史则是对过去的再现。(3) 记忆带有情感色彩，排斥与其自身不容之物；历史是世俗化的思想活动，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4) 记忆把回忆置于神圣的殿堂中；历史则把回忆驱除出去，让一切去神圣化。(5) 记忆与集体相连，既是集体的、多元的，又是个体的；历史属于所有人，具有普世理想。(6) 记忆积淀在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等具象中，历史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和事物间相互关系。(7) 记忆是绝对的，历史只承认相对性。

诺拉把记忆视作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的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二者是一种不可交合的对立关系。但是，他又自相矛盾地说：“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都不是记忆，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所称的记忆之焰，业已消融在历史的炉灶中。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为了证实上述分辨，诺拉认为在法国出现了两种历史运动，一种是史学史的兴盛，这是历史学者在通过对自身的反省驱逐记忆的纠缠，“历史”成为他所谓的上述历史。把记忆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这为记忆之场留下了讨论的空间：“另一场运动本质而言是历史运动，即记忆传统的终结”。伴随记忆传统的终结，记忆之场成为记忆残留物的场域，档案、三色旗、图书馆、辞书、博物馆，还有纪念仪式、节日、先贤祠、凯旋门以及《拉鲁斯词典》和巴黎公社墙，均成为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

诺拉认为，记忆为历史所缠绕 (la mémoire saisie par l'histoire)，由此而出现作为记录的记忆、作为义务的记忆以及作为距离的记忆。在欧洲，档案有三大来源：大贵族世家、教会和国家。作为一种被记录的记忆，档案的价值曾为历史学家所追捧，虽然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人们依旧热衷之，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口述调查的兴盛。在法国，有三百多个调查队致力于搜集“过去传达给我们的声音”。诺拉认为这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意向？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

对每个群体来说，向历史寻找记忆涉及自我身份认同，“记忆的责任来自每个历史学家自身”。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朴素实证主义的文献学历史，专注于以往忽视的问题：历史-记忆一体化的终结催生了各种个体化的记忆，每个个体化的记忆都要求有自己的历史。诺拉认为，这种来自记忆责任的需求催生了记忆从历史学向心理学、从社会向个人、从传承性向主体性、从重复向回想的转移。这是一种新的记忆方式。从此记忆成为私人事务，它让每个人都感到有责任去回忆，从归属感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

除去作为记录的记忆和作为义务的记忆外，还有第三种变形的作为距离的记忆，这体现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诺拉指出，在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那里，历史学家认为通过回想可以复活过去，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裂痕，可以表述为“从前”和“以后”，这反映在历史解释中进步和衰退两大主题上。正是因为与历史的距离感，产生出去除距离的要求，“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正是由于这种距离感，在感知方式的转变下，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被其放弃的民族记忆中的常见之物：记忆之场。

那么，何谓记忆之场呢？诺拉认为它“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记忆之场的“场”一词有三种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如，档案馆是实在的场，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因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也进入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的极端例证。世代观念是抽象的记忆之场，其实在性存在于人口学中，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象征性在于某个事件或经验只有某些人才有的标志性特征。在这三个层次上，记忆和历史交互影响，彼此决定。与历史存在所指对象不

同，记忆之场在现实中没有所指对象，它只是个指向自身符号，纯粹的符号。

本来，记忆有历史的和文学的之分，现在彼此边界模糊，伴随历史传奇的复兴，个性化文献的复兴，文学中历史剧的兴起，还有诺拉并不看好的口述史的成功，他宣称历史是失去深刻性时代的深邃所在，“记忆被置于历史的中心，这是文学之殇”。

《记忆之场》第一部问世后两年，1986年第二部三卷顺利出版。第二部接续第一部所预设的目标，因此，在结语处诺拉仅附上一篇短文《民族与记忆》。第三部三卷于1992年出版，距第二部三卷的出版晚了6年，这固然有写作和编辑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发生了令诺拉不得不深思的两个事件：一是长期对垒的东西“冷战”格局瓦解后，民族-国家模式遭遇了新的挑战，另一个是长期拒绝国家/民族叙事的法国史学内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名为《法国史》的著作，著名的“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在1986年出版了三卷本《法兰西的特性》。^①“记忆之场开始于与这些研究不同的前提，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激进观点。”^②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既然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并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历史，而不是对不在之事重構的历史，那么区分与后者的关系便是其所意欲达成的目标。但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诺拉发现他所生造的“记忆之场”的暧昧性有碍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第三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中，诺拉再次谈到“记忆之场”的内涵，认为这个概念是狭隘的、限定的概念，集中于从纪念碑到博物馆、从档案到口号再到纪念仪式等纪念物，与现实具有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此外，“记忆之场”还具有比较宽泛的含义，承载着象征化的历史现实。本来，“记忆之场”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和神话的表皮，将其条分缕析，但与编者这种主观意图相反，伴随前两部出版后的成功，“记忆之场”

① 中译本参见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② Pierre Nora,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Realms of Memory*, p.xvii.